

商殷與夏周的年代問題

陳夢家

引言

年代學是研究歷史首先要決定的問題。我國夏商周的年代，至今尙無定論。近來各方面對此問題都提出了要求。作者對此問題曾作過一些嘗試，總覺得竹書紀年還是比較可信從的說法，一則它本身是較古的材料，二則它的數字也還完整，三則它所記的史事往往與地下材料相符合。本文一方面提出了竹書紀年可以信得的理由和三統曆不可靠的證據，一方面提出了假使紀年可信應如何安排殷代的一些枝節問題，希望大家加以批評討論。

本文所述，分以下七節：

- 一、西周積年
- 二、殷庚遷殷至殷亡積年
- 三、商積年
- 四、關於漢世的『殷曆』
- 五、關於夏年
- 六、關於世經和三統曆
- 七、結論和推論

商殷與夏周的年代問題

一 西周積年

商殷的年代問題，至少有以下四事：

- (一) 成湯伐桀到殷庚遷殿的年數——商積年
- (二) 殷庚遷殿到帝辛(紂)亡的年數——殷積年
- (三) 成湯伐桀到帝辛(紂)亡的總年數——商殷積年
- (四) 各王的在位年數

倘使我們有了(四)各王年數，那末(一)——(三)的積年自然可得。可惜史料無存。(三)的總積年應是(一)(二)相加而得，但可可靠的記載只有(二)，因此(一)(三)兩數是我們要探求的。(一)(三)兩事共包含了三點：即夏代的終點和商代的起點，遷殷之年，殷代的終點和周代的起點。在年代學上，夏商周三代是相牽連的，要求得殷代的絕對年代，首先要確定周代元年。

西周的元年是問題的，我們在西周年代考（一九四五年，商務印書館，渝版）一書中已有所論述。司馬遷的史記作于紀元前一世紀初季，其紀事終于太初，當紀元前二世紀之末。他的古史年表始于共和元年，共和以前只有三代世表。據年表，周亡于赧王五九年，當紀元前二五六年。自赧王上數至平王共二二五一年，周平王東遷當紀元前七七〇年。由此上推，歷幽王一一年宣王四六年共和一四年，則共和元年當紀元前八四一年。這是史記所定的最早的最早的絕對年代，大致上是沒有差誤的。共和以前，武王至厲王九世一〇王的年數，是沒有記錄的。劉歆世經曰『春秋殷曆皆以殷魯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數』，鄭玄詩譜序曰『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平御覽卷八十五引帝王世紀曰『周自恭王至夷王，四世年紀不明』。據此，可知從西漢初司馬遷至西晉的皇甫謐，都不曾有西周各王的年數，當然無從有西周的積年。因此宋代皇極經世通鑑外紀通志和元初的通鑑前編所定西周各王年數，顯然是沒有根據的。通鑑外紀一注云：『上古至周厲王無年可記，

而皇甫謐諸儒所記皆有年，衆說差互不同。』皇甫謐和金履祥都知道西周無年可記而都定出年數來，他們自己尙不相信，我們當然也無需採用。

太康二年（紀元二八一年）汲冢古冢所出魏國史記紀年十三篇，因係書于竹簡出于汲冢古冢，所以又稱竹書紀年或汲冢紀年。紀年成于魏襄王二十一、二年間（紀元前二九七—二九六年），乃司馬遷以後新出的最重要的史料。裴駰周本紀集解引『汲冢紀年曰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以二五七年爲西周的積年，是否可據，可以下列各事加以考定。

（甲）左傳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郊，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自武王至顯王爲三〇世。周自顯王三十五年至四十六年（紀元前三三四—三二三年），六國次第相王，有亡國之兆，作左傳者當在此時。左傳有歲星紀年之法，歲星的測定據湛約翰（John Chalmers）的推算，係起算于紀元前三〇五年左右（李雅各七經英譯卷五第一部分，頁一〇〇）；據新城新藏的推算，係起算于約當紀元前三七六年左右（東洋天文學史：三九二）。左傳僖公二十一年云：『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自僖公三十一年（紀元前六二九年）至紀元前三二九年（周顯王四十年）適爲三〇〇年；而史記衛世家：『嗣君五年（紀元前三二〇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左傳作者當在此時，即紀元前三二九—三二〇年之間。今假定周顯王四十四年前後（紀元前三二五年）爲左傳作成時代，下距赧王末年尙七〇年，由此假定左傳作者心中以爲西周初至左傳著作當時爲七〇〇年，則

東周積年	615	西周初至 <u>顯王</u> 44	700
<u>顯王</u> 44 至 <u>赧王</u> 末	—70	東周初至 <u>顯王</u> 44	—445

周平王至 <u>顯王</u> 44	445年	西周積年	255年
-------------------	------	------	------

（乙）孟子公孫丑篇下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又盡心篇下云『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

來至于今百有餘歲。公孫丑篇下倒數第二章記去齊之事，而盡心篇下爲全書的末了，是前者『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說明，所以兩處應同屬于一時。孟子生卒約當紀元前三九〇—三〇五年，去齊約在紀元前三一二年。孔子生卒約當紀元前五五一—四七九年（參先秦諸子繫年）。此兩段孟子應有以下的說明：（一）所謂『有餘』至少當有五〇年，否則五百有餘加一百有餘不能成爲七百有餘歲，（二）孟子去齊在紀元前三一二年，即孟子晚年，上距孔子生年二五〇年，卒年一六八年，所以他所說的『孔子而來』當指孔子的卒年，最多指其晚年，（三）文王與孔子之間相距約爲五〇〇有餘（+50）年，是從文王之卒到孔子之卒計算的。據此推算如下：

<u>文王</u> 卒至 <u>孔子</u> 卒	550	<u>文王</u> 卒至 <u>孟子</u> 去齊	700 至 750
<u>東周</u> 初至 <u>孔子</u> 卒	—292	<u>東周</u> 初至 <u>孟子</u> 去齊	—459 — 459

（子）周初至幽王末

258年

（丑）周初至幽王末

241 至 291 年

（丙）西周時代諸侯在位年數，只有魯世家所記最詳。魯國伯禽無年數，自考公至孝公三十六年（當幽王十一年）共二二七年。假定伯禽在位三〇年，則伯禽元年至幽王十一年爲 $30 + 297 = 327$ 年。據左傳昭公十二年云『燹父禽父（即伯禽）並事康王』，而太平御覽卷八十五引『紀年曰成康之世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亦見嚴安言世務書，史記周本紀，論衡增篇引儒書）。成康之世四十餘年，則成王在位當不足三〇年，故伯禽若在位三〇年，是可以並事兩王的。

以上由左傳、孟子和魯世家推算西周年數均在二四〇—二九〇年之間，而（甲）（乙子）（丙）三種則介于二五〇—二六〇年之間，和紀年二五七年尤爲接近。紀年成書于紀元前三世紀之初，其所記西周年數至遲係紀元前四世紀流傳的史料，與左傳孟子當屬同時。紀年所記東周年代，往往較史記正確而與金文相合，詳六國紀年表考證（燕京學報三四、三六、三七期）。它所傳的史料，是比較可靠的。

根據上述的理由，西周總年數應爲二五七年，平王東遷當紀元前七七〇年，則西周元年當是 $770 + 257 = 1027$ 年（前元前）。以此爲基點，可以上推殷的積年。

二 殷庚遷殷至殷亡積年

殷庚遷殷至紂亡的總年數，亦僅見存于紀年。張守節殷本紀正義引『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此段紀年的數字因史記注本有版本之異，頗有出入：

（一）作二七三年 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四九：一四，朱右曾竹書紀年存真當本此。

（二）作二七五年 武昌書局翻刻明震澤王廷誥刊本；同治金陵書局校刊本；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本。金陵本正義多據王廷誥本，會注本正義多據日僧桃源桃源史記抄，較通行本多出一千二百三條。

（三）作七七三年 乾隆殷本史記，誤二爲七，南宋黃善夫刊本（即百衲本）已如此。

商殷總年當不會超過七〇〇年，故七七三必是誤字。（一）（二）兩本相差兩年，今暫取（一）本，因如此殷庚遷殷適爲紀元前一三〇〇年，取其整數易記。

殷庚到帝辛，共八世一二王，世次和各王及位的事實，卜辭已有明證，和殷本紀所記並相一致。但各王在位年數，諸書所記很不完備。尚書無逸說高宗（指武丁）享國五十有九年（魯世家引作五十五年），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稱贊他們的勤勞，並說：『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這不過說祖甲以後諸王遊逸，故有享國不久者，不能因此就說祖甲以後諸王年數都在一〇年之內。由以下所舉的材料，可知祖甲以後仍然有在位二〇年以上的，但也有在一〇年以內的。

遷殷後諸王年數之見于記載者，有以下各事：

無逸	紀年	卜辭	太平御覽八十三引『史記』
殷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69		7
祖庚			
祖甲	33		
廩辛			
康丁			
武乙	35+		
文丁	11+		3
帝乙	2+	20+	
帝辛	6+	20+	

太平御覽卷八十三所引『史記』，與太史公書不是一書，它的來源甚不明白，有一部分則是錄自紀年的（參燕京學報三四：一八二—一八五）。它引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同于孟子萬章篇上，太平御覽卷八十九引『史記』堯伊和篡位事則同于紀年。但它以爲文丁在位三年，則與紀年不合，文丁恐是康丁之誤。

紀年所記晚殷四王之事，只能視作各王在位最低的年數。武乙文丁帝乙三王之事，見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和後漢書西羌傳註所引。

帝乙帝辛的卜辭字體都是細小的，常有武祖乙文武丁等的稱謂，而其文例一致，所以一望可辨。但兩朝卜辭之分

別，則較爲不易。從其記年的卜辭中可以顯然的分別爲兩組，茲舉二祀廿祀之例如下：

(一) 乙辛周祭卜辭有下列兩條：

才十月又二……佳王二祀 前三·二八·一

才四月，佳王二祀 前三·二七·七

此同記『二祀』，同在『三季』，而一在十二月，一在四月。我們知道『祀季』最長不過四個月，決不能從此年的四月到十二月都是三季，因此兩個『二祀』應分屬二王，即帝乙帝辛各佔其一。

(二) 乙辛周祭卜辭有以下兩條，和金文比較如下：

〔癸〕亥……卜貞彫三日自上甲……才三月佳王廿祀 續二·一·三；哲庵六六

癸丑……才六月甲寅彫羽上甲，王廿祀 前三·二八·五

戊辰……才十月一佳王廿祀落日遯于妣戊武乙夷 肆叟（三代六·五二·二）

此同記『廿祀』，一在三月癸亥卜次日甲子三祭上甲，一在六月癸丑卜次日甲寅羽祭上甲，一在十一月戊辰祭武乙之配妣戊。依周祭祀譜，兩條卜辭勉強可同屬于一祀，但非在帝乙之世不可。金文的廿祀，若要排在與上兩條卜辭同王的廿祀，則輪到魯祭妣戊要在廿一祀，故知不屬于一王。

據上所述，則帝乙帝辛兩王，很可能皆在二〇祀以上。如此可知無逸所說祖甲後各王享年甚短，乃是過甚其辭。大約祖康廩辛康丁是比較短的，文丁也不會很長。茲根據二七三年之數試分配各王年數如下：

殷庚，小辛，小乙

約共 60 土

武丁

59（無逸）

祖庚

約短

祖甲

33（無逸）

商殷與夏周的年代問題

履辛, 庚丁

約短

武乙

35 + (紀年)

文丁

11 + (紀年)

帝乙, 帝辛

2 × 20 + (卜辭金文)

總合各數字爲 $178 + 60 \parallel 238$ 年, 尙餘三五年應分配于未估計的諸王和據紀年及卜辭金文所估定的最低年數的諸王。這種分配, 並無確定性, 不過表示二七三年爲遷殷後的積年是可能的而已。

三 商積年

我們既決定二七三年爲殷的積年, 則 $1067 + 273 \parallel 1340$ 年, 乃殷庚遷殷之年。自湯至殷庚遷殷的年數(即商積年), 史無記載, 但戰國及其後有商殷的總年。可分別爲兩組:

(一) 約爲五〇〇年

竹書紀年

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¹⁾

易緯稽覽圖

殷四百九十六年

(二) 約爲五五〇年至六〇〇年

孟子盡心篇下

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

左傳宣公三年

鼎遷于商, 載祀六百

淮南子

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²⁾

(一) 股本紀集解引。

(二) 股本紀集解引。

孟子之說當如以前所說，從湯以後至文王之卒約爲五五〇年左右，所以孟子心目中湯至殷亡約在五五〇年以上。

以上兩說似以後說爲勝，因遷殷後八世一二王共占二七三年之久，遷殷以前至湯九世一九王，所占年數似乎不應少于前者。若采六〇〇年之說，則湯至殷庚有三二七年，較爲合理。 $327+273+1027=1627$ 年（紀元前），可推爲成湯之元年。但左傳載祀六百只是舉一成數，可能少于六〇〇，所以我們始定紀元前一六〇〇爲商代的開始。

殷庚遷殷以前的各王年數，各書偶有記載：

外丙	2	<u>孟子</u> 萬章篇上， <u>太平御覽</u> 八十三引『 <u>史記</u> 』
仲壬	4	同上
太甲	12	<u>竹書紀年</u>
大庚	26	<u>太平御覽</u> 八十三引『 <u>史記</u> 』
小甲	17	同上
中宗（ <u>祖乙</u> ）	76	無從

四 關於漢世的『殷曆』

漢世所傳『殷曆』是所謂古六曆之一。劉宋祖冲之之曆議說『古術之作者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又說『古曆法，並同四分』。（宋書曆志）此『殷曆』不能如晉書曆志和新唐書曆志（僧一行）所說的『湯作殷曆』。自春秋以來，所謂『商』『殷』皆指國族，所以宋國之人稱爲『商人』，孔子爲『殷人』。商頌商書乃宋國所傳之頌之書，並非商代的。此殷曆當紀元前一、二世紀時，不但爲通行的曆法，並且直至劉歆作世經時還是與三統對抗最有力的。

所謂殷曆，有以下的各點：

一、甲寅元

詩文王之什正義引乾鑿度云『曆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易緯乾鑿度（據古經解詁本）云：

商殷與夏周的年代問題

『元曆無名，推先紀曰甲寅。』

二、『甲寅元天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于牛初。』見後漢書律曆志中劉洪言。

三、爲四分曆之1，故 $4 \times 19 = 76$ 年爲一府首（或作部首）， $20 \times 76 = 1520$ 年爲一紀， $3 \times 1520 = 4560$ 年爲一元。詩

文王之什正義據三統曆謂『七十六歲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之日爲初部名，甲子部一也』。後漢書律曆志注引樂業圖徵謂天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窮』。

殷曆部法，參看新城新藏東洋天文學史八八—八九，四五九—四六〇諸頁。

四、以初元元年（紀元前四七年）爲起點，上推一紀一五二〇年至紀元前一五六七年（殷曆太甲元年）爲甲寅元，是爲曆元。紀元前四七年和一五六七年之前一年的十一月皆爲甲子朔旦冬至，世經引『殷曆曰當成湯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五、天元，從初元元年上推六〇五元並一紀爲二七六〇三二〇年，是爲遠距之元。

關於殷曆的記述，僅見于世經所引述和哀平之際的緯書之中，皆不晚于紀元前一世紀，可以信爲當時殷曆的記述。世經和易緯所引的殷曆，若承認其屬於同一系統者，則可得到下列的結果：

紀元前1580

伐桀

1579	496年
1567	484年
1512	429年
1111	29年
1084	2年
1083	1年

成湯元年，用事二年

太甲元年，天紀甲寅元

終六部首456年

戊午部第一年，當三統曆周公五年

乾鑿度文王受命之前一年

戊午部二十九年，乾鑿度文王受命殷曆文王在位及武王伐紂以前

{ 1030 } 五
 1028 } 六
 47

歷譜歲在癸火之年

紀年的殷亡之年

漢初元元年

易緯乾鑿度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入戊午歲二十九年。』此天元用殷曆甲寅元推之爲紀元前一〇八七年（東洋天文學史：九七）。用殷曆部法推之爲紀元前一〇八三年（殷曆譜上編卷四：三）。今用後說，因一五七九年成湯元年至一〇八四年共四九六年，所指的是湯元年至文王受命之年。文王受命應解釋爲文王稱王，而不是受天命伐商。尚書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此受命與易緯之『西伯受命』同指昌即王位。如此可知竹書紀年和易緯稽覽圖的商殷四九六年是算到文王稱王以前，不是算到紂亡。如此殷的積年應是四九六年加文王在位及武王伐紂以前。

文王在王位大約爲五〇年。孟子公孫丑篇上曰『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似本無逸而解釋中身爲五十歲。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乃終』，其義與孟子同。周本紀曰『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呂氏春秋制樂篇曰『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自尚書至呂氏春秋，文王在位年數只有五〇和五一兩說，大約是可靠的。武王爲文王次子，則文王既死之後，及即位時也已老邁，所以武王享國之短是理所當然的。武王死于克殷後的年數有兩說：（一）尚書金縢、周本紀和封禪書說克殷後二年而崩；（二）逸周書明堂位說『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又管子小問篇曰『武王伐殷，既克之七年而崩』，則并伐紂一年而說；淮南子要略曰『武王立三年而崩』，似指伐紂之年爲立年，克殷後二年崩，與（一）同。六年之說似混合克殷前後而言，周本紀集解引『皇甫謐曰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帝王世紀武王『四年始伐殷，爲天子』（初學記卷九），『十年冬王崩于鎬』（太平御覽卷八五）。此雖以武王享國十年，但以即位四年伐殷與世經文王『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之說相同，似有來歷。

以上所述，可得以下兩個結論：（一）文王在位五〇年；（二）武王在位（包括克殷前後）約爲六年。我們以爲武王

克殷前在位四年，克殷後二年而崩，可根據我們對於洛誥的一種新的解釋，作為證明：

文王崩

武王即位元年

武王四年克殷

武王五年，既克殷一年

武王六年，既克殷二年，崩

成王元年，洛誥『以功作元祀……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所謂文武受命惟七年者指武王受命為王以來七年，是年又為成王元祀，則武王在位六年。『文武受命』應同上『文王受命』一樣解釋為王位之授受。

如上所述，據殷曆文王受命為王在紀元前一〇八三年，五〇年而卒，又四年（當紀元前一〇三〇年為武王四年）克殷。是年，據紀元前四世紀的歲星紀年法上推適為『歲在鶉火』之年，與周語下『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之說相符合。再下二年為紀元前一〇二八年，是由紀年推得的克殷之年。

因此我們可以決定，紀元前一世紀殷曆家的商年是：（一）四九六年再加上文武之年，（二）文王在位五〇年，（三）武王克殷前約為四年。如此殷曆家心目中湯至紂亡應為：

$$(1) 496 + 50 + 4 = 550 \text{ 年, 或}$$

$$(2) 496 + 50 + 6 = 552 \text{ 年}$$

此二數介于左傳所記『載祀六百』和孟子『五百有餘歲』之間。我們以上計算孟子『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是從文王卒後算到孔子卒後，有餘歲約為五〇年上下，則孟子『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亦當指湯以後至文王卒後應有五〇年左右，和殷曆的推算相近。

以上說明了殷曆的商年，據世經所述殷曆湯元年至乾鑿度所述殷曆文王受命爲王，共四九六年。這種算法，是從文王元年起算作周年，故殷曆的周年（包括文王）當是八二八年，即從紀元前一〇八三年至二五六年。殷曆和易緯稽覽圖同以四九六年爲商年，和竹書紀年四九六年同數。然則紀年的四九六年也應指湯元年至文王元年以前。大約在戰國時代，有把周代提到文王元年爲開始之年的。

此處應說明兩事：一是稽覽圖，一是紀年的引述。今所見稽覽圖，見載古經解詁函『易緯八種』之內，標『鄭康成注』，而文內有唐代術士附加之語。它的商年數同于紀年，夏周年數則同于世經，『秦五十年』則始于秦昭襄王末年，即紀元前二五六年——二〇七年（赧王之亡至二世之亡）。它可能和其它易緯一樣，多屬于殷曆派，但今本除商四九六年外，其它夏周年數顯然和世經相同，或者後世的傳鈔者受了世經的影響。

殷曆、易緯和紀年同以四九六年爲商年，但前者係計至文王元年以前，而諸書所引紀年有以下三種：

湯滅夏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①

殷自成湯滅夏至于受二十九王^②

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③

就所引文義說，四九六年應計自湯元年至于紂亡，即商殷的積年。但紀年原文如何，今無從校訂，所謂『湯滅夏至于受』等，很可能是引述紀年者所加的說明。

紀年的原文可能如外紀注所引是『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自湯數至文丁是二九王，沒有帝乙帝辛。文丁在位不長，據紀年文丁殺季歷，下一世是文王。文王即位之年，大約就是帝乙的開始。這個推算以下將要說到。

① 殷本紀集解。

② 文選六代論注。

③ 通鑑外紀二。

五 關於夏年

夏的年數比較簡單，各書所記如下：

竹書紀年

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

此據夏本紀集解所引，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多『自禹至桀十

七世』，路史後紀十三注作『汲紀年并窮寒四百七十二年』。

易緯稽覽圖

禹四百三十一年

帝王世紀

自禹至桀并數有窮凡十九王合四百三十二年

以上大致分爲兩種：即（一）四三一或四三二，（二）四七一或四七二。孟子盡心篇下曰『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去了堯舜，夏世亦當在五〇〇年左右。我們可姑定夏元爲紀元前二一〇〇年。

紀年所記，夏四七一年商四九六年，商長于夏，而晉書束皙傳却說紀年的『夏年多殷』。

紀年與易緯相差四〇年，紀年包括窮寒，易緯未說。因此有調停此兩說者，如通鑑外紀以桀八年浞三二年以足四〇之數。此亦非不可能。若如此說，則易緯與紀年的夏商二代年數事實上是相同的。但易緯『周八百六十七年』同于世經，世經說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亦與易緯同。

由于後人所引紀年，常常可用他自己的看法加以說明，如前述殷曆，易緯和紀年的商年可能計至文王而止，而引紀年者以爲四九六年爲湯至殷亡之積年。紀年夏四七一年若包括羿浞則短于商之四九六年，若加上羿浞四〇年則長于商年。後漢時陳忠謨世經『損夏益周』，指夏四三二年太短，周八六七年太長，當時有一種數字，夏年必多于四三二，周年必少于八六七。

世經以紀元前一七五一年爲伐桀之年，加夏四三二年爲紀元前二一八二年，是夏的開始。這個數字和我們所估計紀

元前二一〇〇年爲夏的開始，相差不多。

六 關於世經和三統曆

我們以上的三代年數，一概不採用劉歆的世經。世經並其三統曆俱見漢書律曆志。成容鏡漢太初曆考論三統曆本之鄧平所作的八十一分法的太初曆，所辯很詳實。後世二名混用。若就其曆法的本質（如元法和日法）而說，則太初和三統兩者在基本上是相同的。世經是劉歆的創作，想用史料來證明三統曆的準確，這種作法遂使曆法與歷史年代混淆，而常使歷史年代牽就他的曆法。東漢安帝時尚書令陳忠說『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¹⁾。所論是很正確的。

世經和其它漢世曆術一樣，根據各家的曆法周期虛立一個遠距之元爲始點，于世經爲『三統上元』。世經曰：『漢曆，太初元年（紀元前一〇五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用此二點，世經記述伐桀伐紂之年，如下表所示：

三統上元至 <u>太初元年</u>	143127
三統上元至 <u>伐桀之歲</u>	-141480
<u>伐桀</u> 至 <u>太初元年</u>	1647年
三統上元至 <u>太初元年</u>	143127
三統上元至 <u>伐紂之歲</u>	-142109
<u>伐紂</u> 至 <u>太初元年</u>	1018年

(1) 後漢書律曆志。

伐 <u>桀</u> 至太初元年	1647
伐 <u>紂</u> 至太初元年	-1018
伐 <u>桀</u> 至伐 <u>紂</u>	629年

因此世經曰：『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凡殷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根據世經所述三代年歲，推其相當的公元，約如下表：

紀元前	夏	元	年	四三二一
2182				
1761	伐	年	樂	六二九
1760	商	元	年	六二八
1123	伐	紂	年	八六八
1122	周	元	年	八六七
	一四九五	亡	年	一五三
256	周	初	元	年
105	太			

自伐桀至太初元年共一六四七年。這個年數，劉歆似是從三種元法減剩而得的：

殷曆天元 2760320

三統會元 - 2626560

133760 (四分上元至太初元年，辭下)

四分上元至伐桀 - 132112

三統伐桀至太初元年 1647

也可以說，一六四七年加上古四分上元至伐桀和三統會元，其總數爲殷曆天元。

西漢的曆家有所謂元法，是因四分法而生的天文周期。四分法一年爲三六五又四分之一，而一九年七閏，故必四乘一九年而日無餘數。淮南子天文篇最先立『天一元』即『甲寅元』之名，依此法則：

$$4 \times 19 = 76 = 1 \text{ 紀} \quad \text{立春與合朔一致}$$

$$76 \times 20 = 1520 = 1 \text{ 終} \quad \text{立春與合朔一致而日名一復}$$

$$3 \times 1520 = 4560 = 1 \text{ 元} \quad \text{立春與合朔一致而日名年名均一復}$$

所謂日名年名即記年日之干支經四五六〇年而十一月朔旦冬至復爲『日甲子歲甲寅』。殷曆元法亦如此。世經曰：『元帝初元二年十一月癸亥朔旦冬至，殷曆以爲甲子，以爲紀首。』又引『殷曆曰當成湯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終六部首』。據殷曆，成湯十三年當紀元前一五六七年，下至初元二年（紀元前四七年）爲一五二〇年，即殷曆的一紀。以初元二年爲起點，上推一更古的遠元作爲天地開闢的第一個甲寅年，是年之前一年十一月甲子冬至朔旦。由初元二年推得其數爲：

$$605 \times 4560 + 1520 = 2760320 \text{ 年}$$

亦即六〇五個元法加一紀（殷曆以一五二〇年爲一紀）。所以後漢書律曆志記載主張殷曆的馮光陳晃『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自獲麟（紀元前四八一年）至初元二年（紀元前四七年）爲四三四年，故 $2760320 +$

$434 = 2760320$ 年。

漢書律曆志所記五星見復的周期，最為詳備，後世曆志都不能超出它的範圍。它和今測極相接近。三統曆求得五星大周期的公倍數『為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為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此最後的數字二六二五六〇即會元，是五星會終與日月會歲的公倍數。

所謂四分上元，僅一見於世經，曰：『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其八十八紀甲子府首入伐桀後百二十七歲。』由其稱紀和府首，知其為近于殷曆的四分法。我們若據三統所推伐桀至太初元年之一六四七年加入，則：

$$132113 + 1647 = 133760 = 88 \times 1520 = 29 \times 4560 + 1520$$

由此可知此四分上元與殷曆天元屬于同一元法。（參東洋天文學史：四七八—四七九）四分上元至太初元年為一三三七六〇年，此數適為前述殷曆天元減去三統會元所得之數。

我們以上曾算出天元減會元減古四分上元至伐桀為一六四七，今知天元減會元等于四分上元，則可更簡明的列出：

$$\text{四分上元至太初元年} \quad 133760$$

$$\text{四分上元至伐桀} \quad - 132113$$

$$\text{四分上元伐桀至太初元年} \quad 1647$$

此數和三統上元伐桀至太初元年，完全相同。劉歆所定伐桀之年，是從此得來的，而放在他的三統上元的系統之內。三統上元與四分上元的元法是不同的，這是一個矛盾。天元是從初元元年（紀元前四七年）推上去的，而天元減會元得四分上元至太初元年（紀元前一〇五年）之數，這又是一個矛盾。世經不管這些矛盾而融會于一處而利用之，而仍能自成一系統，這也非偶然的，誠如朱文鑫所說：『三統沿襲太初，仍不出古曆四分之範圍。』⁽¹⁾

(1) 曆法通志：六七。

一六四七的年數以及以紀元前一七五一年爲伐桀之年尚有第三個說法。世經述殷曆伐桀之年在紀元前一五八〇年，較之世經的一七五一年晚了一七一年，所以世經說殷曆『少百七十一歲』。此所少的即世經從殷曆伐桀年往上加的一七一年。世經爲何加此一七一年，因三統『九章歲爲百七十一歲而九道小終』，所謂『章』即一九年七閏，故 $9 \times 19 = 171$ 年。

由上所述，則世經所定伐桀伐紂的絕對年代和商周積年都是人爲斬斷的，故對於歷史上的三代年數，不免損益以求合於他的曆法。就三統的曆法而言，本是極進步的，它的日食周期，五星見復的周期，歲星的超辰計算，都遠遠超過前曆，而且相當精密。用此精密的曆法推定古代用稍疏的曆法所作的文獻記錄，若果然密合，適足以證明推定之無據。這種以曆法求合史籍的工作，不但徒勞，而且有害。董作賓殷曆譜一書所作的企圖和世經是一樣的，其精神也很相似。他一方面批評三統曆之疏，一方面還是接受了世經的商周積年和伐桀的絕對年代。劉歆只有商殷的積年，而殷曆譜根據皇甫謐以後所追加于殷世諸王的年數，附以西曆紀元及儒略日，作成年曆譜。用力甚勤，實不足據。

陳忠謨劉歆『橫斷年數』，我們以爲其所橫斷的約有二端：一是從不同來源的曆元中橫斷了伐桀之年，一是由此往下用歲星橫斷了伐紂之年。經此兩斷而得商殷六二八年周八六七年的總數。

世經伐紂之年的截斷，舉出兩事以爲證明。一是歲在鶉火，一是周初五十六年的史籍中年月日的符合。關於前者，因國語周語下有『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之語，劉歆用太歲超辰法推算當在紀元前一一二二年，故以此爲伐紂之年。所謂『歲在鶉火』者乃是紀元前四世紀創行的歲星紀年法，當時以爲歲星（即木星）沿黃道的十二次（今名十二宮）運行十二年而回復到原次。鶉火即十二次之一，指歲星在黃道上的某一位置。但我們今日知道，木星的恆星周期率不是十二年而是一一·八六二年，繞天一周，行十二次（宮）。當劉歆之時，也已算出歲星不是十二整年一周天，而是一四四年行一四五次。他以此方法推算則紀元前一一二二年歲在鶉火，而其前後相距十二年之各年亦然。我們若根據左傳昭公九年所記哀公十七年（紀元前四七八年）歲在鶉火之語，用不超辰法推算則得：

$$478 + (45 \times 12) = 478 + 552 = 1030 \text{ 年（歲在鶉火）}$$

而在一〇三〇年之前之後任何十二或十二倍數之年，都是歲在鶉火。

『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是紀元前四世紀時的人根據當時歲星不超辰法而推定的。劉歆用超辰法來重作推定，並以此爲其斷代的證據，是很不合理的。

爲了確定紀元前一一二二年爲伐紂之年，他又採錄了自以下五十六年（武王滅殷至康王十二年）間有關的史籍，來證明其月朔月相與他所推定的符合。這種證據是不可靠的。第一，新唐書曆志所載僧一行的大衍曆議，以紀元前一一一年爲伐紂之年，也用了劉歆所採用的某些史籍（今古文尚書）證明『自伐紂及此，五十六年朏魄日名，上下無不合，而三統以己卯爲克商之歲，非也』。故知用某些史籍排列周初曆日，可以得到不同的結果。第二，劉歆採錄的史籍是純駁不一的，可以分爲三類：（一）較可靠的史料，如今文尚書的洪範召誥洛誥顧命和左傳國語（或稱外傳）；（二）較晚的史籍，如文王世子、書序；（三）屬於古文的武成、畢命、月采等。除今文尚書外，其它都是戰國至秦的材料。武成和月采出于逸周書的世俘篇和月令篇。他所引的武成和世俘有所不同，如『惟一月壬辰（世俘作丙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世俘作丁巳）……粵若來三月（世俘作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這些不同，可能是版本的不同，更可能是劉歆的改易。

總之，世經所載三代年數，都是人爲的，而它所評掣的殷曆却保存了一些較原始的材料。

七 結論和推論

以上所論，可以總結如下。

根據竹書紀年，商殷和西周總年如下：

商總年 496年

自湯起

殷總年 273年

紀元前 1300—1028年

殷庚遷殷至紂亡

西周總年 257 年 紀元前 1027—771 年 武王克殷至幽王末年
根據殷曆，商的年數如上。

商總年 496 年 紀元前 1579—1084 年 至文王元年前
550 年 紀元前 1579—1030 年 至紂亡
652 年 紀元前 1579—1028 年 至紂亡

我們若采取殷曆之說，紀年的四九六年也是自湯元至文王受命前一年，則湯元在紀元前一五七九年，伐桀在紀元前一五八〇年。參考孟子和左傳商五六百年之說，重訂其約數如上。

夏	紀元前 2100—1600 年	約 500 年
商	1600—1028 年	約 550 年
殷	1300—1028 年	273 年 (或 275 年)
西周	1027—771 年	257 年
關於殷庚遷殷以後的二十三年，則可以推測如上：		
殷庚，小辛，小乙	1300—1239	60 土
武丁	1238—1180	59 據 <u>無逸</u>
祖庚	1179—1173	7 土 據『 <u>史記</u> 』
祖甲	1172—1140	33 據 <u>無逸</u>
廩辛，康丁	1139—1130	10 土
武乙	1129—1095	35 + 據 <u>紀年</u>
文丁	1094—1084	11 + 據 <u>紀年</u>

帝乙 (1084—1080) — (1060—1050) 20 + 歲卜辭
 帝辛 (1060—1050) — 1027 20 + 歲卜辭

以上的安排，只是一種試探，看看二七三年是否能容納下十二個王朝及史籍上或卜辭上所指示的各王年數。我們將武丁排在紀元前一八〇年以前五九年中，是根據了武丁卜辭的三次月食。卜辭所記壬申、甲午、庚申三個月食，據Dubs所作紀元前十一至十四世紀安陽及中國所見月食表（哈佛亞細亞學報十卷二號，一九四七年）可以推定在紀元前一八三、一二一八、一二二九諸年，所以武丁不能晚于一八〇年。如此給了遷殷後的殷庚與小辛小乙以六〇年上下的年數。我們將文丁的最晚排在紀元前一〇八四年，是因為根據殷曆一〇八三年文王繼其父王季為西伯。晉書束皙傳和史通疑古篇皆引紀年云『文丁殺季歷』，北堂書鈔卷四十一引作『文丁殺周王』。後漢書西羌傳引紀年云『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又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紀年云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歷來朝』。凡此皆稱季歷當武乙的季世，而文丁殺季歷在時代上是相當的。我們若信從一〇八三年為文王元年，而假定一〇八四年為文丁之末年，為文丁殺季歷之年，為帝乙即位之前一年，便符合了紀年二九王四九六年之說。因為從殷曆湯元（一五七九年）到一〇八四年為四九六年，自湯至于文丁共二九王。如此，則帝乙帝辛相當于文王在位的五〇年和武王克殷前在位之年，據卜辭金文乙辛各在二〇年以上，亦頗相適合。

這樣的安排，則武丁須在一一八〇以前，帝乙帝辛須在一〇八三以後，武丁和帝乙之間，又必須排出祖甲三三年武乙三五年多，所剩下的祖庚廩辛康丁和文丁各王就不容許超過一〇年。紀年記文丁十一年事，恐他只有十一年。關於祖庚年數，我們采取『史記』的七年說，廩辛康丁相加應不足一〇年。如此適應了無逸『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之說。『史記』所說文丁在位三年，與紀年不合，當係康丁之誤，因據上所排，康丁只能有幾年。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帝王世紀『帝乙即位三十七年』，『紂即位三十二年正月甲子敗績』。帝王世紀只有此二王有年數，可能本諸紀年佚文。但所述帝乙三七年應是武乙之誤，周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作『帝

武乙，殷本紀則說武乙徙河北。由『帝武乙』誤爲『帝乙』。至于紂三二年之說，似乎很有可能。孟子公孫丑篇上說『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又有賢人『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則紂之享國不應該很短。

據我們所排定，武丁祖甲武乙都在三〇年以上，帝乙帝辛都在二〇年以上。出土甲骨刻辭，屬於武丁的最多，其次爲祖甲、乙辛和武乙的。康丁卜辭少于廩辛的，二者爲數也不多。可以定爲文丁卜辭的也少。祖庚卜辭和武丁卜辭沒有顯著的分別，似乎祖庚很短。廩辛卜辭接近于祖甲卜辭的晚期，康丁卜辭和武乙卜辭也相近。看來廩辛長于康丁。武乙卜辭和乙辛卜辭之不同，大于乙辛之間的差異，可見武乙很長。乙辛卜辭比較一致，它的年代與武丁一世相約，而武丁卜辭也難從字體上看出早晚。凡此從卜辭上觀察，似乎上所排定的相當的年數，大致上是相差不遠的。

一九五四年七月重作于北京

附註：

文中東洋天文學史係根據沈濬所譯新城新藏東洋天文學史研究，一九三三年中華學藝社出版。

唐蘭先生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年代問題，見一九五五年三月份的新建設，請參閱。